



曾国藩诗文研究

Research on Zeng Guofan's
Poetries and Proses

黄 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曾国藩诗文研究

Research on Zeng Guofan's
Poetries and Proses

黄 伟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藩诗文研究/黄伟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7-301-26476-8

I. ①曾… II. ①黄…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清后期 ②古典散文—文学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9685号

书 名 曾国藩诗文研究

ZENG GUOFAN SHIWEN YANJIU

著作责任者 黄 伟 著

责任编辑 徐 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47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印刷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3.75印张 234千字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晌,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曾国藩诗文研究》序

胡 明

曾国藩进入学界的视野、成为学人的攻研对象几乎是紧挨着他的逝世。他六十二岁死在位极人臣的任上,他的赫赫事功与道德光环特别是他的中国式封建政治伦理精髓的非凡实践震铄了几代知识精英的心灵,令他们发出“独服曾文正”的心声。他的学问伦理、他的知行传奇几乎天下仰慕;他的政治道术、他的官场经纬,研壁考察者熙熙攘攘、连绵不绝。他的文学诗文也自然地成了学界探讨的对象,一百五十年来著述一堆。今天,人们对曾氏的政治伦理及其官场范型的价值判断固然还有剧烈争论,对他的道德养成、心性义理规范下的诗文理论、诗文实践同样充斥着各种争议。——我们的曾国藩诗文研究究竟应该看重什么?究竟应从哪个角度出发又聚焦在哪一个层面?我想这大抵涉及两个问题:一、清诗文、晚清诗文的一般意义;二、曾国藩在哲学文化史的历史定位。所以我这里只就这两个问题谈点看法,力图开凿出、引导出历史人物声名影响科学评价的追索通道。

明清易代,表面而言是夷夏之变,但军事政治上纷纷乱局平定之后,清承明制,政治制度、文化路线几无所改。清廷还礼葬崇祯,声称自己是为驱逐李自成“闯贼”恢复社会秩序而入主中原的,力图消减易代的抵抗情绪。除了留辮一项之外,清朝的文化政策充满了对汉文化的亲和力,将异族文明的冲击波大大减弱。清廷全面吸收汉文化的政治伦理,除了蓄志挑动满汉矛盾的,朝廷刻意礼待汉族知识分子,保证他们有稳定的个人正途及努力用世的仕进路线。在宋明王朝留下的成熟制度下,清帝国努力的方向便是促进封建文化全面成熟,接纳由文明冲击与融合带来的文化异质,他们明智地放弃了自己的文化主导权,并以一种谦虚而热忱的学习姿态来接受汉文化。汉文化在成熟的封建制度呵护下迅速恢复,呈现出一派蔚为大观的繁荣景象,这构成了清诗文最为深广的文学生态。

有清一代的诗文在康、乾时达到了顶峰,大有比肩追埒汉唐之势,这或可以看作是一种回光返照,表面上因兼收并蓄而流露满天,而内在发展潜力已消耗殆尽。过了康、乾时期,不仅中国古诗文到了尾声,而且中国古诗文的理

论也走出了集大成的底线。曾国藩出现的晚清,文化上综合、总结、集大成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曾国藩只能在旧文化的底线外转圈,他苦心孤诣摸索心得,却因道路狭窄、前景昏暗而惶恐紧张。他的诗文严格地说并不算太成功,但政治上的声名功业却让他的诗文理论与创作登上一个时代的高峰,或者说被推上了学术关注的前台。

从整体的客观文化视角来看,晚清在文化意义上并不属于它生存的那个时代,通行的文学史一般都将晚清文学划归近代文学,传统诗文在清中叶之后的发展或演变已属于另一个时代。随着传统文学生态的日趋萎缩,延续了千年的古典诗文连带它的学术画上了终结的句号,句号之后则是现代意义的文学研究和现代文学自身的崛起。胡适之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便是一本描绘这个演变趋势与行进路线的琳琅满目的精彩图册。

晚清诗文与那个时代的文化政治趋势相同,即趋新,士大夫知识官僚竞相讲新学,趋时务、功利之鸷压过了义理之辨。诗文之道过了集百世之大成、调千古之鼎鼐的历史门坎,完成了自身建构总结的历史任务,死水微澜,淌向“近代”,呈现一派平庸枯乏的气象。尽管“诗界革命”“古文中兴”还不时涌出潮头、溅出浪花,却只是苟延残喘而已。一个时代无大家——无大家的理论擘画,更无大师的引导折衷,小家领袖包括鼓吹掀动新风者只是在传统的大限内扮演陈陈相因的角色。诗在“宋诗”里打转,从祁雋藻到程恩泽到同光体的宋诗;文在“桐城”里打转,桐城姚鼐被奉为广大教主,领导了一个时代的词章、义理、考据的解释与评判。

曾国藩的出场并没有带来新的亮色与光环,他也正是那个时代标准型的诗界新锐与朝廷词臣,所谓“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也主要是靠了这一点。他在太平成象的道光朝九年之内官场职级与诗文声名直线上窜,官做到了二品。补插几句,曾国藩二十三岁中秀才,起步算晚的,但二十四岁中举人则又是早的。二十八岁中进士进入仕途,一路风正帆悬,逐浪而进,与几个同僚搭档,镇日酝酿奏章,吟诵诗文,所谓“二三邦国英,风流相依倚”。到了三十七岁,又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至二品,他那时在家书中得意自矜:“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这近十年里,他还频频点为各种名堂的考试官,除了礼部,还兼署兵部、刑部、工部左或右的侍郎官衔。倘没有后来的太平军兴,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政治军事危局,曾国藩大抵也是以文臣高官起结终了,当然会留下更多的诗文作品。

我们这里也顺便看一下他的政治对手洪秀全科举的不幸。洪氏生于1813年,少曾国藩两岁。道光七年、十六年、十七年三应广州府试,不取,打击巨大,特别是十七年那次,他已二十五岁,三试未中(秀才),“愤激暴病,迷

狂一月有余”，之后便选择了一条与清王朝政治对抗的路。倘他的考试科举顺利如曾国藩，恐怕后来的拜上帝会与太平天国运动便不会发生，他领导的长毛“发匪”也不会碰上冤家对头的“曾剃头”。

作为朝廷重要的词臣，曾国藩当然十分看重自己的诗文，并把诗文的理论探索与创作成绩提高看作终身职志，也时时想有所开拓与突破。他担心的也正是在诗文方面没有大的成绩，不能垂功后世，他的遗嘱也总是以自己诗文上的无功碌碌，不能“独辟康庄”，没有来得及建功立业而遗憾终身，“寸心所得”还未来得及流播天下已变成了“广陵之散”。

曾国藩诗文的研究者大都认为：曾诗突破了“江西”藩篱，甚至还超脱了宋诗韵味；文则突破了“桐城”的门墙，自姚鼐入而不从姚鼐出，所谓自出手眼，大大提高了“桐城”在天下学界的地位。所以一般的文学史都肯定他改造、扩建桐城派的历史功绩，并由“桐城中兴”的通道将他推上一个时代诗文建设的领袖地位。

实际上曾国藩对诗与古文在认识态度上是有差别的，重文甚于重诗，创作成绩也是文胜于诗。曾国藩对于诗十分自信，抱负甚大。他的古诗学苏黄，“每以奇崛雄肆为高”，近体则多学陆游，理论上也十分心仪陆游，注意到兼尚冲淡之趣、洒落之机。有时学得太像不免粘上放翁式的“滑溜机械”，但决不是主流。我们随便举一首他青年时代的诗为例：“去年此际赋长征，豪气思屠大海鲸。湖上三更邀月饮，天边万岭挟舟行。竟将云梦吞如芥，未信君山铲不平。偏是东皇来去易，又吹草绿满蓬瀛。”（《岁暮杂感》之四）他的诗句往往流荡出一般英雄气，如“击楫谁挥祖逖鞭”“大厦正须梁栋柱”（《失题》之三）；“黄鹄一举何其高，纷纷燕雀非吾曹”（《送谢果堂前辈归江南》），追求的是沉郁峻拔的气象，但其中总多少显出豁露的底色。

曾国藩对于诗虽自信十足，但总觉得可与切磋酬唱者天下几无，孤掌难鸣。他在家书中曾说，“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妄言者”——可见他在诗的王国里站立起的姿态。大概正是这一层原因，曾国藩把更多的心思与注意力放在了古文上。他对古文也确下过一番苦功夫，涵泳讽诵，浸润沉潜，积年之功，气势、识度、情韵、文采、趣味均有可观之处，大抵也形成了“朴茂闳肆”“峥嵘磅礴”“俊伟奇逸”的风貌。曾国藩尤其看重古文的气势，由“气”成“势”，壮阔凛烈，下笔讲求“奇倔”，措词刻意“瑰玮”，追求一种“雄奇万变”阳刚风发的动态效果或者说视听气象。他认为古文通于人的立身问学，质性体气应该在上成仁取义，顶天立地；在下自我超拔，截断众流。——他陶炼出一套新的古文理论，或者说在古文理论中注入一腔活的哲学魂魄：文章义理通向道德心性的滋养，诗文创作是内在意志、

信仰的外化,须与心目中的完美人格精神相合一。他将理学文艺观与经世致用的时代需求结合起来,艺文的“知”与政治的“行”结合起来,与“诚”——“不诚无物”、“礼”——“克己复礼”结合起来;用力打破宋明理学中那些苍白、懦弱、僵硬的虚文教条,以及内圣稀薄、外王不足的流弊;激励知识个体、学术栋才积极入世,建功立业;开拓出了一条立身问学、经济时用、报效天下的健康循环的理论通道。

曾国藩的政治大业完成后,学界特别是他的门生、部属、故旧对曾诗曾文尽情赞颂,捧得很高。天下学子也乐于追随,涌成潮流。无疑,一个历史人物功业伟大、声名煊赫,会助长有关他的美学评价的蹿升,也会加速他的文艺主张、审美理想的传播,有时结合主流哲学、意识形态的鼓噪发生更大的社会宣传效应。他们的“心之所向”,一经“腾为口说,播为声气”,足以“转移风气,陶铸一世之人”。诗文改革、美学主张如此,哲学认识论、功利得失论、成败是非论的流布成气候亦如此。曾国藩凛烈大气,官声显赫,横绝一个时代,他的功业实践、知行轨迹在世运播迁中奔腾流荡,推动着一个时代的主流伦理,又拨动一个时代知识精英的心弦,他的“气”与“势”照耀得一个时代光华夺目、人心跳腾,他的咳唾吟唱也会掀起大潮阔浪,影响刺激一个时代积极入世的文化心理和官僚知识分子的行为哲学,甚至他的正史本传上“功成不居,粥粥无畏”(《清史稿·曾国藩传》)一句话都大大增加了头上的道德光环,使他正面站在一个时代政治伦理的高岸——他的劝谕与选择、他的赞成与反对、他的认识与判断必然要影响一代人的价值观念,刷新一代人的普遍心性。相比之下他的诗文的亲炙力反而并非那么巨大。

文章之道既通于心性义理,又通于政治事功,影响世道,牢笼人心。曾国藩倡导的诗文理论,炮制的诗文作品既已蹿升至时代楷模的高度,我们便可以于中窥探一个时代英雄勋业的轨迹和哲学人生观建构的由来。研究他的诗文与研究他的理学文艺观、礼学政治观是相通的。这些“学”理的勾连,这些“识”、这些“论”也是我们后人刻意建设的,刻意寻索的,刻意宣扬以求自我完善的。李鸿章——他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了解曾国藩、最得曾国藩神机之传的门生,他说过一句话,后人不太注意。他说曾国藩“论古今成败之迹,则又归之于命”(《求阙斋文钞序》)——曾国藩对“命”的认识远远没有被学界开掘,我们只是大概知道他是深信“天之未丧斯文”的,他好几次果敢地自杀都被人救起,正是“天之未丧斯文”的明证。他的最后成功或许正可以“归之于命”。我们真应该信服正史本传上的那一句话了:“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最后提一笔曾国藩的两部作品:《讨粤匪檄》和《圣哲画像记》三十二则。

第一部作品,宣传不多,流世不广,但却是曾国藩精心炮制的,与历史上骂曹操、骂武则天的两檄并列而三,姿态横阔,置词高妙而气势凌厉,令后世再有才力、再牛气的文章写手和宣传鼓动家汗颜;第二部作品则可见出曾国藩的哲学见解、诗文主张、问学途径及背后的礼义骨植、政治意识形态。所谓“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于此”——这里有曾国藩的真精神、真信仰、真心机,是成功立名的真正曾学“师资”。

黄伟同志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过《关于清诗》的长文,为唐宋元明清五朝诗的系列研究及宏观总结画上了漂亮的句号。这里黄伟同志又拿来他的《曾国藩诗文研究》请我作序。我不能对他的著述作过多的赞赏,只绕着晚清诗文和曾国藩的话题说了一些意见,有些意见正是黄伟在书中发明或论证的。我相信随着这本书的出版,学界对这两个关节的认识与理解会深进一步,或可引发出对曾国藩研究的更大兴趣。曾国藩曾有诗句:“名章俊句无多秘,传与门人总服膺。”(《奉题丹魁堂诗集》)过去我写文章总幻想能影响同一代的学人,但愿这篇小序除了黄伟还有别的人“服膺”。

目 录

引 言	(1)
一 曾国藩诗文研究概述	(2)
二 清代诗文视野下的曾国藩	(11)
第一章 曾国藩诗文理念的时代文化背景	(25)
第一节 社会范式变迁与曾氏诗文哲学旨趣	(25)
第二节 学术范型转换与曾氏诗文艺术取向	(31)
第二章 曾国藩诗文理念的承祧与追求	(55)
第一节 桃唐祢宋诗学格局的线性叙述	(55)
第二节 桐城派诗文理念的承继与超越	(64)
第三节 体系化的理论构建	(77)
第四节 诗文选本凸现的审美理想	(88)
第三章 “琢辞辨倔强”的诗歌追求与“时流颇忻向”的诗坛影响	(101)
第一节 曾国藩诗歌内容解读	(102)
第二节 曾国藩诗歌审美风格评析	(121)
第三节 曾国藩诗歌创作思维与形式技巧	(124)
第四节 曾国藩诗歌的影响考察与比较研究	(132)
第四章 “述作窥韩愈”的为文自信与“拓兹疆宇广”的古文中兴	(142)
第一节 曾国藩古文创作论略	(143)
第二节 曾国藩古文体气风骨评析	(154)
第三节 曾国藩古文撰述结构与形式规制	(164)
第四节 曾国藩古文的影响考察与比较研究	(171)

第五章 曾国藩对道咸同文坛的意义	(176)
第一节 “立德、立功、立言”的文化影响与人心浸润	(176)
第二节 曾国藩于道咸同文坛的精神匡正	(179)
第三节 曾门弟子的文坛影响	(182)
第四节 曾国藩诗文的特定文化意义及其在道咸同文坛的历史 地位	(199)
参考文献	(204)

引言

清代诗文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传承史上的集大成者,无论就诗文形态体式的审美演变还是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都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①,清代特定的政治与文化背景导致清诗、清文呈现出迥异于前代的风貌。清代的文化政策、学术思想以及中西文化的交融都对清诗、清文的艺术取向及演进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诗文的审美旨趣上,清人也一反明人偏于独尊、互相攻讦的狭隘做法,于诗既推崇宋人之筋骨思理,又不菲薄唐人之风神情韵,形成了桃唐祢宋的创作主流;于文既讲秦汉之矩矱,又不为唐宋八家所牢笼,奠定了文道契合、骈散同存的古文发展合理态势。大体而言,清代诗文的发展趋势是从兼收并蓄到自出手眼,力图在熔铸各朝特色的基础上创作出一种自具面目的“清诗、清文”。但是清代诗文的研究,远没有同时期戏曲、小说那么受人瞩目,蔚然成派^②。而且,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远逊于唐宋诗文。不可否认,研究者们厚古薄今的思维模式潜意识地阻碍了清代诗文深掘工程的顺利进展。

曾国藩正是这样一个在被忽略的文学发展链条上又被忽略的诗人、古文家。曾国藩五岁起受学于庭,诵读颖悟。道光十一年后,即陆续负笈于涟滨、岳麓书院。其少时即器宇卓犖,不随流俗。凭借坚韧不拔的意志与“未信君山划不平”的进取豪情,曾氏于道光十八年中式第三十八名进士。曾国藩“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③,遂更其名为“国藩”。后凭借其“忠诚体国”与“勘定大乱”的勋绩渐跻卿贰之位,成为晚清政治史上烜赫一时的重要人物。在晚清文学史上,曾国藩也是一位令封建文人寻声企景、项领相望的文坛祭酒。他的文章大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经世之文,因而“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评价,极易受到政治气候的影响”^④,但他以豁达的

①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8页。

② 陈文新、鲁小俊在《清代文章的研究现状及前景展望》的论文中指出:“在清代文学研究中,就广度和深度而言,依次是小说、戏曲、诗词、文章。”并就文章研究之所以受到冷落的主要原因进行了深入合理的分析。参见《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③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台北,文海出版社,1924年版,第10页。

④ 朱东安:《曾国藩文选·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胸襟与过人的器识所构建的囊括“气势”“识度”“情韵”“趣味”“机神”等范畴的审美体系,无疑体现出传统文学总结者的开阔视野与艺术修养。在诗学发展史上,他屡屡被称引为晚清宗宋诗派的一面大纛,导引了同治、光绪年间的宋诗运动。在古文传承史上,曾国藩对桐城古文心向往之,同时对其流衍既久的窳弱积弊甚为痛心。作为政治家的曾国藩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在狭隘的理论作坊内寻求医治桐城派弊端的解药,而是结合晚清危如累卵的国势,将眼光投放到更广阔的视域,强调了以“经济”入文的重要性,才使得桐城派古文“起死回生”、得以中兴。

一 曾国藩诗文研究概述

曾国藩(1811—1872),谱名传豫,学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字伯涵,道光十一年(1831)改号涤生,湖南省湘乡县(今双峰县)人。道光十三年入县学为秀才,道光十四年岳麓书院肄业后,中乡试举人。道光十八年应会试,赐同进士出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职检讨。道光二十三年以翰林院侍讲升用,道光二十四年转翰林院侍读,道光二十五年升翰林院侍讲学士,补日讲起居注官,道光二十七年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官居二品。咸丰二年(1852)丁母忧回籍,受命办理团练,组建湘军以对抗太平天国。其间屡败屡战,于同治三年(1864)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受封为一等勇毅侯,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位极人臣。同治九年,奉旨督办天津教案,处置结果导致朝野诟骂之声大作,曾氏也“外惭清议,内疚神明”^①。后于同治十一年(1872)卒于两江总督任上,清廷谥号“文正”。

作为中国近代社会范型转换时期的关键人物,无论在政治史上,还是在文学史上,曾国藩都是一个备受关注、颇具争议的重要人物。“中兴名臣”的美誉和屠杀人民起义的“刽子手”“汉奸”“卖国贼”等恶名杂糅在一起,构建成一个颇具争议的矛盾集合体,在学界也呈现出众说纷纭的热闹景象。同时,作为文学家的曾国藩,于羽檄交驰之余,不废吟诵,也留下了丰厚的诗文作品,囊括诗歌、散文、日记、奏议、书信等各种文类。并编纂了《经史百家杂钞》《十八家诗钞》《古文四象》等选本以推扬自己的文学主张,这也使其成为中国古典诗文发展演进史上不可回避的重镇。一百四十余年来,在政治学、哲学历史范畴中,后人对政治家曾国藩的关注与解读经历了或褒或贬、毁誉参半的发展过程;对文学家曾国藩的研究与评价也经历了推崇、否定到客观

^① 曾国藩:《复潘祖荫》,《曾国藩全集·书信十》,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7266页。

评判的演进历程。自 1872 年至今,对曾国藩诗文的研究与评价时断时续、时褒时贬,以时间为跨度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

这一阶段是曾国藩诗文研究的肇始期,曾国藩逝世以后,其门人弟子及幕僚友朋或握笔吮毫以托哀思,或蒐集遗文哀辑成册以告慰逝者。前者如黎庶昌的《曾太傅毅勇侯别传》、李鸿章的《曾文正公神道碑》、张德坚的《太傅文正公湘乡侯相挽诗七律二十首》以及刘蓉的《曾太傅挽歌百首》等;这些文献资料或许会包含一些溢美的成分在内,但也不失为全面认识和评价曾国藩诗文创作与影响的重要依据。如黎庶昌在《曾太傅毅勇侯别传》里特别提到曾氏“文章奏议尤美,别有集”^①;李鸿章在《曾文正公神道碑》中也简要概括了曾国藩治学为文之道:“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②张德坚《太傅文正公湘乡侯相挽诗七律第十八首》云:“胸包万有贯天人,理学兼为社稷臣。……书摹欧柳饶风韵,文似韩苏见性真。”^③刘蓉的《曾太傅挽歌百首》记载:“万变文章可坐知,王杨卢骆自纷驰。桐城义法非无据,要在天机入妙时。”^④并在诗下加注云:“公于古文法韩、欧,亦甚取近世方氏义法及姚氏阴阳刚柔之说,而颇病宗桐城者之拘拘于绳尺也。”

后者如同治十一年(1872)黎庶昌编,张瑛刊于苏州的四卷本《曾文正公文钞》;同治十二年(1873),方宗诚编校《求阙斋文钞》,长沙陶澍勤斋刊刻杨书霖、张华理编选的四卷本《曾文正公诗稿》,同年,长沙谦善书局印行许铭彝校刊的《求阙斋联语》和《曾文正公联语》;同治十三年(1874),王定安、曹耀湘编纂刊印四卷编年本《曾文正公文集》,长沙传忠书局刊印了《曾文正公诗集》,同年,薛福成的《曾文正公奏议》刻印发行;清光绪二年秋(1876),传忠书局又刊刻了三卷分类本《曾文正公文集》《曾文正公诗集》,稍后印行了由李瀚章主持编纂的《曾文正公全集》,王定安的《求阙斋弟子记》《求阙斋读书录》与曾门四大弟子之一的黎庶昌编撰的《曾文正公年谱》也正式刊印。

在晚清特定的时段里,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功业萃于一身的光环使曾国藩达到了传统进取模式的极限,成为科举时代下封建士子们的

① 黎庶昌:《曾太傅毅勇侯别传》,《拙尊园丛稿》卷三,《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29页。另见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附录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01页。

② 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合肥李氏三世遗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辑,第762—763页。另见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附录三》,第506页。

③ 张德坚:《太傅文正公湘乡侯相挽诗七律第十八首》,见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附录三》,第516页。

④ 刘蓉:《曾太傅挽歌百首》,见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附录三》,第520页。

楷模。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冲击了儒家文化一贯维系的价值体系,而曾国藩挽狂澜于既倒式的成功也为他披上儒家文化卫道者的神圣外衣。在内忧外患、百弊丛生的时局下,稍微有点志气的读书人也会鄙视那些只知“白发死章句”而“问以经济策”却“茫如坠烟雾”^①的腐儒。而曾国藩把“经济”纳入文学体系的魄力与实践,也让那些亟欲报国而不知所从的士子看到一线希望。曾国藩显赫的政治地位、广博的文学兴趣都无形中促使其被天下读书人视为精神偶像,加上他虚怀纳士、广交文人学者和后期“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的热忱,足以造就他“老儒宿学,群归依之”^②的文坛领袖地位。再加上“曾门四大弟子则包办了晚清古文事业”^③,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曾氏成功的巨大光环影响之下,其诗文大都被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乃至无以复加地推崇。如王韬就认为“盖公之相业似韩、范,公之勋名似李、郭,公之文学足以并孔、邢、欧、曾而无愧色。不独一代之完人,亦一时之全才矣”^④。

曾国藩去世后,其门人弟子及诗友幕僚尽皆对其诗文进行叹赏和揄扬。这一方面对曾氏诗文的流衍起到极大的导引作用,为曾国藩诗文研究提供了最早的、尽可能详细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带有溢美色彩的文学史定位也为后世研究者或褒或贬、针锋相对的观点冲突埋下了伏笔,为曾国藩的诗文研究留下了一个“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开局。

这一阶段的曾国藩诗文研究虽然多点开花,但没有由点及面形成体系。形式以片言只语的零碎论述为主,散见于挽诗、序、跋、书信以及个人文集中。研究的焦点多侧重于曾国藩的文坛地位及文学史意义的梳理上,虽然对曾国藩的诗文理论及创作风格也有所探讨,但涉笔不多。主要观点多聚集在曾国藩与宋诗运动、同光体的关系梳理上,湘乡派与桐城派的渊源考辨上。如吴敏树就认为曾国藩不甘久居人下的倔强个性注定不会拘囿于桐城派的一家之言,而会赤地立新、自立坛坫,吴敏树尝言“果欲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⑤,曾氏心有戚戚,承认吴氏此语“斯实搔着痒处”。其在《复吴敏树》中就明确提出“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⑥的自负之言。王先谦也认为“曾文正公亟许姬传,以为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

① 李白:《嘲鲁儒》,《李太白全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57页。

② 赵尔巽:《清史稿·曾国藩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17页。另见王澧华校点《曾国藩诗文集·附录三》,第481—482页。

③ 钱仲联:《“明清八大家文选丛书”总序》,《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④ 王韬:《重刻〈曾文正公文集〉序》,《菽园文新编》,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7页。

⑤ 《清史稿·曾国藩传》也认为:“曾国藩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可与吴敏树之论相参证。《清史稿》,第11917页。

⑥ 曾国藩:《复吴敏树》,咸丰九年(1859年)十二月初二,《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1153页。

然寻其声绪,略不相袭,道不可不一,而法不必尽同,斯言谅哉”^①。而曾门四大弟子的黎庶昌、吴汝纶、薛福成都认为曾国藩的诗文理念是对桐城派的承继与发展,指出曾国藩是在姚鼐诸人的基础上拓桐城堂庑而大之,并对桐城末流的虚车之弊进行了修正与补救。黎庶昌认为,“本朝文章,其体实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辞始雅洁,至曾文正公始变化以臻于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②。薛福成认为,“桐城派流衍益广,不能无羸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③。

第二阶段:辛亥革命至新中国成立前夕。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吹响之后,在陈独秀“三大主义”的号召下,“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讨伐声就不绝于耳。在桐城派屡屡受到排斥与冲击的情况下,对曾国藩诗文创作及文坛定位的研究却取得了新的进展。无论传统文人抑或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干将都对曾国藩的诗文成就予以高度褒扬,如旧派文人虔诚地宣称,“国藩文章诚有绝诣,不仅为有清一代之大文学家,亦千古有数之大文学家也”^④;章太炎也亟许其“善叙行事,能为碑版传状,韵语深厚,上攀班固、韩愈之轮”^⑤;梁启超虽对桐城古文不无訾议,但也强调曾国藩即使没有任何勋绩,单凭文章亦可入选《文苑传》^⑥;李慈铭也曾赞曾氏全集为“近代之杰作”^⑦;刘师培也认为“惟姬传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涤生之博大雄奇,则又近今之绝作也”^⑧;新文学运动的领袖也赞誉其为“桐城派中兴的明主”^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第一大将”,“曾国藩的魄力与经验,确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曾国藩在当日隐隐的自命为桐城派的中兴功臣,人家也如此推崇他。”^⑩

这一时期关注的焦点与前一时期基本一致,依然纠结在曾氏与桐城派渊

① 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另见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21页。徐珂《清稗类钞·文学类》亦有类似记载,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884—3886页。

②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拙尊园丛稿》卷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八辑,第82页。又见于黄霖、蒋凡主编《新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

③ 薛福成:《寄龛文存序》,《庸庵文外编》卷二,《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另见黄霖、蒋凡主编《新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晚清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1页。

④ 徐凌霄、徐一士:《曾胡谈荟》,《国闻周报》,第6卷第33期。

⑤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说林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0页。

⑥ 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国闻周报》,第11卷第17期。

⑦ 《国闻周报》,第11卷第32期。

⑧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1907年3卷1期。又见《刘师培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⑨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⑩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卷二,《民国丛书》,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91、92、101页。

源梳理以及孰轻孰重的文史定位上。在对曾国藩与桐城派的源流考辨问题上,大致可分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派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中兴的功臣,如新文学运动的领袖胡适就不止一次提到曾国藩是桐城古文中兴的第一大将,刘师培也指出,在曾国藩诗文的导引下,桐城文章得以“骤倡于湘赣鄂西”^①,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里也指出:“曾国藩善为文而极尊桐城,尝为《圣哲画像记》,至跻姚鼐与周公孔子并列;国藩功业既焜耀一世,桐城亦缘以增重,至今犹有挟之以媚权贵欺流俗者。”^②姜书阁也指出,曾国藩自身的勋绩人望与诗文成就,使其成为天下士子项领相望、竞相学习的楷模,“一时为文者,几无不出曾氏之门;或从而问学,或辟入幕府,济济多士,于焉称圣”^③,这也造就了如火如荼学桐城的热闹场面。

另一派则续吴敏树遗绪,认为曾国藩不为桐城家法所拘囿,自桐城入而不自桐城出,实为晚清文坛自立坛坫、独辟堂室的别开生面者。曾国藩自称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④,但“平日持论,并不拘于桐城矩矱”^⑤,并且曾氏对阳刚雄浑文风的偏嗜,以及《经史百家杂钞》等选本与《古文辞类纂》的审美偏差,都足以说明曾氏所谓的以桐城派为师法对象,只不过是“借为文章波澜”而已^⑥;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也认为:“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主。……他又加添了政治经济两类进去,而且对孔孟的观点,对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为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⑦朱自清也特别指出曾氏诗文与桐城派的区别之处:“桐城文的病在弱在窄,他却能以深博的学问、弘通的识见、雄直的气势使它起死回生。……他的眼光也比姚鼐远大的多。他的幕僚和弟子极众,真是登高一呼,群山四应。这样延长了桐城派的寿命几十年。”^⑧钱基博也认为:“曾国藩以雄直之气,宏通之识,发为文章,又居高位,自称私淑桐城,而欲少矫其儒缓之失……异军突起而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一时流风所被,桐城而后,罕有抗颜行者。”^⑨

① 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1907年3卷1期。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③ 姜书阁:《桐城文派评述》,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2页。又见杨怀志、潘忠荣《清代文坛盟主桐城派》,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④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0页。

⑤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55页。

⑥ 李详:《论桐城派》,《国粹学报》,1909年4卷12期。

⑦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8页。

⑧ 朱自清:《经典常谈》,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137页。

⑨ 钱基博:《中国文学史》附录《清代文学纲要》,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42页。